

了。根据他交代的情况，我们就派杨荫池去灌县与灌县县委书记长赵鹤琴、县长孙实先接洽。然后，由孙实先、赵鹤琴、三青团主任王学崇、县特委会秘书郑世荣一起开会研究，决定采用的办法是：不派人下去逮捕人，而是由县上出面通知各乡保联保主任，由联保主任把人带到县党部来办理自新手续。这些人都是不是逮捕来的，当然还是逼迫来的。

钟嘉麟叛变后，起初在特委会内部任干事，后来派去成都当特委会秘书，之后又调去宜宾区特委会做助理秘书，再后又调去灌县当特委会秘书。后来（一九四七年）王人杰做秘书，他又做情报组长。因为他乱搞男女关系，又吃鸦片烟，我们对他印象不好，早就冷淡他了。他主要和刘道生往得熟。

张国富是因为有灌县关系送在灌县劳动服务营（没送去重庆五云山战时青年训导团），因为他在受训中表现好，省特委会把他弄在特委会里做干事。以后他离开省特委会做生意去了，在长顺街卖纸烟一类东西，后来病死了。石成玺是“复兴社”的，那时我也在那里，我们比较熟。

一九四九年灌县特委会秘书不是王人杰，王人杰已调温江了，在温江做特委会秘书。灌县特委会秘书是肖襄，逮捕张大成是肖襄的时候的事，肖襄可能清楚。

（已经本人核实修改）

思想反审自传(摘录)

△一九四一年九月，又由廖匪宗泽替我在敌成都行辕弄了一个不支薪的咨议，作为招摇的工具。这时我为了急欲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对反革命的工作非常积极，曾经诱骗刘道生、钟嘉麟对党的组织作了相当的破坏。

△一九四一年十月，诱骗钟嘉麟背叛革命，使党在灌县、新津、新都、成都市等地的组织被敌特委会破坏，牵连范立孚、曾矩等五六十人。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先后由敌法官提出意见，经我同意签准将革命和进步人士曹心哲、李昌藻、范立孚、曾矩、田志超、曾福华、周永春、吴祯柏、杨成勋、陈树屏、马翹宇、张国富等四十二人及进步人士向师鲁等十余人送入成都劳动营及敌重庆战时青年训导团（即是集中营）。

△一九四一年五月起至一九四七年七月止，先后同意敌法官提出意见，将革命人士及进步人士陶思普、马仁海、赵逸民、尹智奇（志祈）、席纪仁、李亚军、尚志璋（知章）、胡春圃（浦）、周介趾、刘学源（女）等一百七八十人强迫“具保释放”。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曾由敌省特委会派往灌县督导所谓的行动，结果逮捕过张国富、尚志璋（知章），并送敌省特委会。另外，就地传讯过赵逸民、殷耐修两人，均就地保释。

杨荫池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

（杨荫池系省特委会三组副组长，解放后被我政府镇压）

关于灌县特委会和张大成的被捕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受到敌省特委会处分，在温江免职，降调灌县敌特县分会秘书。

到灌县除了敌“蓉站”用邮件寄来两份所谓的“命查办”的公函外，一个是调查灌县都江水利工程师三个人的思想言行，我随便找义务干事王志及刘文兴去调查，无结果，函未回复。一件是命调查伪西康省主席刘文晖到青城山的动态与随行人，我未得结果，亦未回复。因在灌县之敌特委会除了秘书我外，仅有敌组长田诚伯及敌干事钟嘉麟、篮自强二人，一切反动情报均向敌干事钟嘉麟索取。我消耗大，一方面要应付敌省特委会人事室及秘书室的所谓高级匪特，一方面本地之敌参议员及敌自卫总队匪特也要应付，因此我用的组长、干事一律支半薪。原因是他们都是本地人。灌县是个鸦片烟出入口子，心里还是想贪污，于同年十月底，始由敌组长田诚伯建议，筹组十人通讯队，人员已由田诚伯找好了，并印好了工作证，但报敌省特委会不准成立，因此始未成立。然而在灌县虽仅三个多月，所做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恶非常之大。第一是奉温江冯匪均逸伪专员之密令逮捕县男中教员张大成。

△一九四九年十月，冯匪均逸突然从温江拍电给敌县长程匪文蔚及我，要我们在灌县逮捕进步青年张大成。当时，我和程都有一个邀功面子思想，觉得灌县的事事先我们都不知道，

标题系编者加的。此材料摘自肖良《思想反审自传》

你温江倒知道了，于是不愿马上执行。等了两三天，冯匪派温江王人杰来灌，又忙协同去危害逮捕张大成，这说明我的反动思想在解放前始终于蒋匪帮结合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突然接到省特委会密令，内容约分四项：一、命敌特秘书、组长及干事在三日内携带行李及短军服与手枪一支到成都报到，唯留一至二人本地籍者在会作联络；二、令将所有文件、资料、情报就地焚烧，其余重要而待办者则由携省办理；三、今后敌省特委会随敌省府行动，区分会不管局势如何变化，应设法与敌省特委会取得联络；四、应利用一切方法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并设法控制民众武力。我接这个密令后于当日午夜十二时秘密约县敌干事周鹏，把所有敌特分会之新旧文卷、情报拿到敌自卫总队部（与敌特委同一院子）厕所左旁空坝上烧毁。同时，电话约来干事钟嘉麟（因他住蒲村），告诉他我即到成都受训，把十二月份领的米给他三斗，并告诉他随时抽空到县城内敌特委会内看看有无重要事情，因为留在会内的干事周鹏是不懂所谓的公事。这时，敌组长田诚伯已表示和我一道去成都。到了四号，我因得知田诚伯临时不去了，我乃独身一人到成都敌省特委会报到。

肖襄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肖襄系原灌县特委会秘书，现成都市斌升街房管所油漆工）

关于张大成的被捕访问肖襄

肖襄口述 陈先咏记录

时间：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

地点：成都市斌升街房管所

肖襄：（原灌县特委会秘书，现成都市斌升街房管所油漆工）王人杰当时是温江行署保安司令部保安科长，兼区特委会主任秘书，他在灌县干了五六年。张大成被捕是他们来灌县抓的。

临近解放，蒋政权已快垮台，国民党加紧了对共产党的镇压。张大成是丰乐事件发生后把他牵连出来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几号，温江专署专员冯均逸打了个密电到灌县伪县府，内容是说民主联军起义，内有张大成、马锡录等人策动，是共产党策动起义。县长兼军法官程文蔚接到后，马上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参加的有警察局长、国民党书记长、民众自卫总队长、省民训督导、县参议会议长，我也参加了。程文蔚说，冯均逸打了个密电来，丰乐场民主联军起义，是县男中教员张大成、马锡录等人策动，叫逮捕马锡录、张大成等人。会议意见分歧，县长、参议长不同意。当然不同意逮张大成等人并不是说同情共产党，而是之前他们（联防三军）已在丰乐那边逮了一些人，逮那些人时都不通过一下地方，现在要地方出面去抓，地方有意见，并说要逮让他们自己来逮。这样，灌县就迟迟没有动手。会后第三天，专署王人杰打来电话，询问县上

执行密令情况，县上讲了没逮和没逮的原因。第四天，温江保安司令部李友寿、王人杰来到灌县，找到程文蔚，当时我也在场。程文蔚说，你们要逮捕你们去，但要通过县党部书记长仰瑞文，灌男中校长彭××（名字记不起了）。当晚，王人杰、仰瑞文、彭校长我们一起去抓张大成，半路上仰瑞文就溜了。王人杰、彭校长我们去到学校，张大成还在给学生讲课。彭校长把张大成叫出来，然后王人杰拿出手枪逼其到县党部。到县党部仰瑞文又溜了，叫王人杰找自卫总队。自卫总队队长罗英就叫分队长腾了一个寝室出来，把张大成关在了里面。在审问中，张大成一直没有承认身份，审问没有结果，张大成岳丈还去自卫总队质问，还与张大成谈了很久。后来张大成就由王人杰和两个便衣武装押上汽车送去温江。车上没有捆绑张大成。

在温江有半个来月，后来送去成都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不收，因为没拿着张大成什么证据，只是嫌疑。这样又改送去将军衙门省特委会。据说张大成在狱中很坚强，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二、本资料所依据的主要原始材料目录索引

(编拟这个“目录索引”时，我们是这样想的：

1.当研究或使用这个本子里的资料的同志对其中的史事产生疑问时好查找原始材料；

2.这些目录的拟出，愿它能为史料工作者提供一点资料信息；

3.目录里提到的资料撰写人的地址或通讯处，愿它能为要找此人的人提供下落。

编拟这个“索引”，也许是画蛇添足，还请史料工作者指教。)

1.干玉梅（现国家物资总局工作）1981年9月28日所写《一九二九年前灌县革命活动情况的回忆材料》。

2.干玉梅（同上）1982年5月10日给灌县党史办公室的复信。

3.王用全（1929——1930年灌县县委“组织”负责人，现灌口镇居民）1981年8月所写回忆录。

4.王用全（同上）1982年1月所写《现代革命史略补充资料》。

5.王用全（同上）1982年2月3日所写回忆录。